

朱榮智·著

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

朱榮智 · 著

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

67·9·0298

• 81019 •

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

著者 朱榮智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電話：七〇七四一五一三
郵摺：一〇〇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第二次印行

定價：新臺幣八〇元

序

世或謂：『三百篇以前，中國無文學創作；魏文帝典論論文以前，中國無文學批評；梁劉勰文心雕龍以前，中國無文學理論。』此似是而非之論也。

夫文學創作者，與生民而俱來。自有生民，即有情志；情志鬱勃於中，即欲表達於外：其表達於聲音之抑揚頓挫者爲「音樂」，其表達於肢體之俛仰屈伸者爲「舞蹈」，其表達於語言之意義與節奏者爲「詩歌」。發爲詩歌，即文學創作也。凡古初之民，莫不如是，又不獨我中國爲然。相傳葛天氏有歌八闋（見呂氏春秋古樂篇），伏羲有網罟之歌，神農有豐年之詠（並見太平御覽引晉夏侯元辨樂論），堯時有擊壤之歌（見列子），而舜則有卿雲之歌（見太平御覽引尚書

大傳），雖其辭多出於周末、漢、晉人所傳，未盡可信；然其事則頗合於理，或者口耳相傳，有其事，亦有其辭，而其辭或爲後人所潤色，或爲後人所改作，已非其本真耳。他如尚書益稷篇有股肱歌，乃舜與臯陶唱和之作：孟子梁惠王篇引夏諺，「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」尚書湯誓稱夏末民謠，「時日曷喪？予及汝偕亡！」（孟子引「曷」作「害」，意同）大學引湯之盤銘，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史記伯夷列傳載伯夷、叔齊之採薇歌，「登彼西山兮，採其薇矣！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！……」又宋微子世家載箕子過殷故墟，作麥秀歌，「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；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！」……凡此之類，舉出於三百篇之前，吾人豈可盡斥之爲僞耶？三百篇之詩，非可突然而產生於周，前乎此，殆必有導其先路者。吾人謂三百篇以前，中國無詩歌「總集」，則可；謂三百篇以前，中國無文學創作，則不可。吾故曰：謂三百篇以前，中國無文學創作，此似是而非之論也。

與文學創作相並而生者，爲文學批評。創作者表達其情志於外，必思能激動他人之情志。若寂然默然無應答者，則亦必索然嗒然而無復創作之意趣矣。音樂之作，必有聽者在；舞蹈之作，必有觀者在；使聽者、觀者之情志爲之激動而共鳴，相與同歌同舞，而融爲一氣，此固作者之所冀望者也。文學之創作，亦何獨不然？當作者表達其情志時，必有其讀者在，固亦冀望其讀者之情志與之共鳴，悲則同悲，喜則同喜。就讀者言，以身世、環境、個性、學養、經歷、遭遇之各殊，未必盡能與作者同悲同喜，於是好之、惡之、是之、非之……種種之文學批評生矣。蓋自有

讀者，卽有文學批評；此亦自然之勢也。我中國之文學讀者，非自魏而後有；則文學批評自亦不待魏文帝而後有。孔子謂：「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（見論語八佾）孟子與公孫丑論小弁與凱風二詩，以爲小弁親過之大者，不怨則疏；凱風親過之小者，怨則不親。故小弁之怨、凱風之不怨，皆親親之仁也。高叟以小弁之怨，爲小人之詩，孟子則斥之爲固陋。（見孟子告子篇）公孫弘稱：「詔書律令下者，文章爾雅，訓辭深厚。」（見史記儒林傳）揚雄評景差、唐勒、宋玉、枚乘之賦曰：「必也淫。」評賈誼、司馬相如之賦曰：「賈誼升堂，相如入室矣。」（並見法言吾子篇）桓譚謂：「文家各有所慕，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數，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。」（見文心雕龍定勢篇引）又謂：「予見新進麗文，美而無採；及見劉、揚言辭，常輒有得。」（見文心雕龍通變篇引）王充言：「觀谷永之陳說、唐林之宣言、劉向之切議，豈徒雕文飾辭，苟爲華葉之言哉？精誠由中，故其文語感動人深。」（見論衡超奇篇）……如此之類，皆針對文學創作而發之文學批評，何一不在魏文之前？吾故曰：謂魏文帝典論論文以前，中國無文學批評，此似是而非之論也。

文學批評出於主觀者多，綜合若干文學批評，細繹其中之原理、原則，是爲文學理論。文學理論者，乃客觀存在於諸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之外者也，而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又往往受文學理論之指導與影響。文學理論之於文學批評，如影之隨形；既有文學批評，即欲追求其原理、原則，以爲其批評之依據，而文學理論自隨之而產生，此亦自然之勢也。卽如孔子取詩三百篇以教

弟子，其論關雎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，即爲文學批評。然孔子未嘗止於是也，又綜觀諸詩，而追求其創作之原理與原則，則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曰，思無邪。」（見論語爲政篇）此言文學創作必須具有純真無邪之情思也，關雎之所以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者，即由於作是詩時之「思無邪」耳。孔子又曰：「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（見論語陽貨篇）此言文學之功用，可以啓發人之情志，可以考見人之情志，可以溝通人之情志，可以宣洩人之情志；亦可以敦厚人倫而增進知識。孔子又曰：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」（見禮記經解篇）此則言文學之功用，又可以陶冶人之情志，其所以敦厚人倫者，皆由於此也。孔子又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（見論語季氏篇）此則言文學之功用，又可以訓練人之言語。文學之言語必精美而動人，浸潤於文學者久，則其言語亦必精美而動人；用之於內政，必能說服國內之人，而政令行；用之於外交，必能說服國外之人，而使命成；故孔子又曰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（見論語子路篇）此則又言文學之功用，可以施於內政與外交也。據此可知孔子已有文學理論。孔子以後，如孟子言文學鑑賞之理論，有「知人論世」、「以意逆志」之說（見孟子萬章篇）；司馬相如言文學體製之理論，以「合纂組以成文，列錦繡而爲質，一經一緯，一宮一商」，爲「賦之迹」（見西京雜記），以「包括宇宙，總覽人物」，爲「賦家之心」（見同上）；揚雄答桓譚之間，謂「能讀千賦則善賦」（見新論道賦篇引），答或問，謂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」。

(見法言君子篇)，前者謂能吸收前人創作之經驗，則自能創作，後者謂文學作品之風格每隨文學作者之人格而有異；桓譚曰：「賈誼不左遷失志，則文彩不發；淮南不貴盛富饒，則不能廣聘駿士，使著作文書；太史公不典掌書記，則不能條悉古今；揚雄不貧，則不能作玄、吉」(見新論求輔篇)，此則言環境影響於文學創作者甚大；王充論文，貴乎「稱實」(見論衡物勢篇)，不尚「浮誇」(見論衡對作、藝增等篇)，貴乎「有用」(見論衡佚文、自紀等篇)，不尚「虛譽」(見論衡案書、佚文等篇)，此則言文學創作，形式須與內容相稱，題材須對世道有益；魏文帝典論論文始創文氣之說，因以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皆為才性所限，而各有其偏至；晉陸機文賦言文學創作之心理歷程至為詳盡，摯虞文章流別論述文學創作之體製類別亦頗為繁富……凡此之類，又何一非文學理論耶？中國之文學理論又豈必待梁劉勰文心雕龍而後有？劉氏之書特集梁以前文學理論之大成者耳，不得謂其前竟無文學理論也。吾故曰：謂梁劉勰文心雕龍以前，中國無文學理論，此亦似是而非之論也。

朱生榮智從葉慶炳先生游，獲聞其緒論，亦知中國文學理論不自文心雕龍始也，乃欲探索其淵源之所自，遂撰成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一書。既付剞劂，而問序於余。余觀其書取材甚豐，而條理頗密，深喜其用力之勤、收穫之富。因略述文學創作、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所以形成者、三者間之關係及其分際、以及中國文學創作不始於詩三百篇、中國文學批評不始於魏文帝之典論論文、中國文學理論不始於梁劉勰之文心雕龍之故，以為其書之序。蕭統曰：「夫椎輪為大輶之

始，增冰爲積水所成。」（見文選序）兩漢文學理論亦椎輪耳、積水耳，既有所此，其後「踵其事而增華，變其本而加厲」（語見文選序），乃有魏、晉、南北朝之文學理論，而劉勰得以集其大成。數典不可忘祖，尋流必先溯源，榮智之爲此書，其用心可謂深遠矣！余知讀者閱之之後，當亦必能知夫榮智之用心也！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高郵高明敬撰。

目錄

序	一
緒論	一
先秦學者文學觀概說	七
一 孔子之文學觀	八
二 孟、荀之文學觀	一六
三 墨子之文學觀	一三
四 老、莊之文學觀	一四
五 韓非子之文學觀	一七
兩漢文學理論產生之背景	一一
一 兩漢學者對文學之認識	一一三
二 漢賦之高度發展	三八

三 儒家道統之影響	四二
兩漢之文學理論家及其主張	四七
一 揚雄	四七
揚雄之生平	四七
揚雄之著作	四九
揚雄之文學理論	五〇
揚雄文學理論之評價	六三
二 桓譚	六六
桓譚之生平	六六
桓譚之著作	七〇
桓譚之文學理論	七四
桓譚文學理論之評價	八三
三 王充	八四
王充	八四
王充之生平	八五
王充之著作	八六
王充之文學理論	八九

王充文學理論之評價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四 其他學者之文學理論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司馬遷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班固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王逸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鄭玄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兩漢文學理論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地位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一 承繼前代之文學理論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二 反映當代之文學創作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三 影響後代之文學批評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附錄 重要參考書目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緒論

論諸古今中外文學發展之原理，文學作品之產生，必早於文學理論之誕育。著述既多，作家輩出，於是蔚成風氣。學者或品其良莠，或第其高低，或論其背景，或述其技巧，文學理論、文學批評乃相繼興起焉！

夫一代有一代之文學，更迭而相乘也。兩漢之時，中國文學之發展，已由最早之詩三百篇、屈原之楚辭，推衍爲鋪采摛文之漢賦。漢繼秦火之後，人民亟須休息，故貴黃老，蕭規曹隨，行無爲之治，民以安樂，國以富強。武、宣二帝，文治、武功尤其鼎盛於一時，遂奠定漢代四百年之規模。其時，諸侯君王均獎掖文士，愛好文學，如吳王劉濞、梁孝王劉武、淮南王劉安，皆折

節下人，招致四方名士，枚乘、鄒陽、司馬相如諸人，均以專長辭賦，得蒙恩寵。所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！文風既盛，作家於是蠭起。初期之賦家，或不免楚辭之影響，屈原之離騷，又為千古之辭宗，其文弘博麗雅，為後世所模範，故兩漢學者論楚辭之言甚多，自淮南王安以降，司馬遷、揚雄、桓譚、班固、王逸皆是。

自漢武帝用董仲舒之策疏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家，儒家思想成為漢代學術思想之主流。漢代，方術盛行，學者解經，往往雜以陰陽五行、讖緯災異之說，此雖已失先秦儒家之真貌，而原道、徵聖、宗經之思想，仍然領導政治與學術，學者之文學理論，猶以此為正鵠。蓋漢賦本為鋪張夸飾、爭妍唯美之文學，漢人既喜其文字華采，而又惡其虛辭無用，故託以古詩之餘意，借諷諫之美名。不獨漢賦之發展，因此而昌盛，即漢代學者之文學理論，亦假此以發揮也。

揚雄好模擬，早年喜愛辭賦，嘗依違屈原之離騷，作反離騷、廣騷及畔牢愁，復模擬司馬相如賦而作甘泉、羽獵、長楊、河東四賦；晚年則多模擬學術之文，其法言一書，即模倣於論語。先秦以來，評論文學之人，多為文學家之客串，揚雄早年善於作賦，故多評論辭賦之言，其論作賦之法，有「能讀千賦則善賦」之語，若此「模倣說」，確為一切文學藝術創作途徑之一。揚雄之文學理論，其最重要者，則為「諷諫說」，主張辭賦宜有託諷之旨。惜乎漢代帝王提倡辭賦，旨在消遣娛樂而已，故辭賦之中，雖有諷諫之意，卻欲諷而反勸，君主往往覽其文而忘其用，故揚雄晚年，有所謂「雕蟲篆刻，壯夫不為」之語。「諷諫說」乃漢武以還，文人論賦之要旨，固

不止揚雄一家而已，惟揚雄法言中三致其意，故特標舉焉！

桓譚之文學觀，頗有可觀者焉！其所謂文，界闊已釐然劃定，與學術之文殊異。新論一書，惜已亡佚，今所殘存者，唯嚴可均全後漢文搜輯稍多。漢光武帝好讖緯災異之學，譚獨敢勸諫反對，幾置身死地；王充著論衡，疾世俗之虛妄，其反抗時代之精神，桓譚實先啓其端倪。新論載「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，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，使著作文書」云云，頗能闡明環境與創作之關係；又載其嘗因激一事而作小賦，思慮太甚，感動發病，曰：「盡思慮，傷精神也。」亦能強調文章出苦心之意。桓譚之文學理論價值極高，惜其亡佚甚多。

王充之書，極為繁富，性書、譏俗節義、政務之書外，所著論衡八十五篇，有二十餘萬言，蔡邕入吳會，嘗得之，祕玩以爲談助。此書立意，旨在疾世俗之虛妄，故不乏評駁之文字，其於文學理論，創見尤多，書虛、語增、儒增、藝增、超奇、佚文、書解、對作、自紀諸篇皆有之。夫文辭之夸飾，與天地並生，此說見於文心雕龍夸飾篇，而王充早已言及，並述文辭增飾之由，乃起於俗人好奇。論衡藝增篇曰：「俗人好奇，不奇，言不用也。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，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。」黃侃文心雕龍夸飾篇札記及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，皆以爲王充反對文學之增飾，其實，王充所反對者，乃災異之變，迷信之事，傳書虛妄之辭，然其儒增篇曰：「爲文不益則美不足稱，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。」可見王充並非全然反對增飾。

王充論文，主張文貴有用，其所用者，在於勸善懲惡，此固漢代學者文學觀之共同特質。若

夫文有優劣之別，而無古今之分之文學觀，尤彌足珍貴。王充既反對貴古賤今之思想，故亦反對模擬。論衡自紀篇曰：「飾貌以彊類者失形，調辭以務似者失情。百夫之子，不同父母，殊類而生，不必相似，各以所稟，自爲佳好。」其意以爲讀古人書，貴能變化以爲己用，若徒能諷誦，墨守章句，則如鸚鵡能言之類而已，故超奇篇主張「文由胸中而出」，文貴創作。

兩漢之文學理論，捨揚雄、桓譚、王充三家，其餘如司馬遷、班固、王逸諸人，亦有可取。太史公批評屈原、司馬相如之言，分別見其本傳。史遷謂屈原「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絜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」云云，不僅稱美屈原文學造詣之高深，文字之簡練，辭旨之幽微，且強調文學作品與個性之關係。其論創作之原理，屬於情志一派，太史公自序曰：「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」如西伯演周易，孔子作春秋，史遷以爲「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。」所重在情志之發抒。而其批評司馬相如「雖多虛辭濫說，然其要歸引之節儉，此與詩之風諫何異？」則偏重載道之思想。

班固之書，雖多因襲史記，其文學理論則頗能自立一家之言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闡說辭賦之源起，道理極是。兩都賦序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」之語，雖同於先儒詩有諷諫之意，而獻賦之所說，足示後人漢賦昌盛之時代背景。其離騷序對離騷之批評，頗有褒貶，故於淮南王安離騷傳所謂「屈原之志與日月同光」，認爲「斯論似過其眞」，又於屈原之露才揚己、忿懥沈江，尤有微詞；然極稱離騷文辭弘麗，許爲辭賦之宗，則褒美之意可見。

王逸楚辭章句於班固所謂「屈原露才揚己」云云，爲之辯白伸冤，可稱平允，然謂「離騷之文，依託五經以立義焉！」則不免附會穿鑿之譏。至於離騷經序曰：「離騷之文，依詩取興，引類譬喻，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，惡禽臭物以比讒佞，靈脩美人以媲於君，宓妃佚女以譬賢臣，虬龍鸞鳳以託君子，飄風雲霓以爲小人。」以詩之比、興強調離騷之寫作技巧，王逸是第一人。

鄭玄注詩經，有詩譜序，其論詩之起源與作用，與詩大序可相發明，影響於後代之文學批評甚大。詩大序早於詩譜序，因其作者言人人殊，或以爲子夏，或以爲衛宏，疑不能定，故今從略，但述詩譜序而已。

本文計分四章，第一章先秦學者文學觀概說，所以見兩漢文學理論之淵源。第二章兩漢文學理論產生之背景，分由兩漢學者對文學之認識、漢賦之高度發展、儒家道統之影響三端，申述其概要。第三章兩漢之文學理論家及其主張，則敍說兩漢各家之文學理論。揚雄、桓譚、王充允稱大家，故各獨立一節，其餘如司馬遷、班固、王逸及鄭玄諸人，歸結於一節而已。第四章兩漢文學理論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地位，意在探討兩漢文學理論之評價，且爲全文之總結。

夫中國文學批評之發展，曹丕典論論文爲成篇之首，其勤爲一書傳於今者，則始於劉勰、鍾嶸。在此以前，先秦諸子祇有文學觀，兩漢學者唯見文學理論，其汎議文意，往往間出而已。唯溫鵠爲江河之始，椎輪爲大輅之本。兩漢之文學理論，雖乏體密而思精，不免疏略以碎亂，然後世之文學批評，多有淵源於此者，開創之功，豈可淹忽哉？